

# 西夏文化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陈育宁

**摘要：**西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具代表性。立国前，西夏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准备阶段，从青藏高原迁到了黄土高原，游牧文化逐渐融入了以夏州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区。立国后，西夏虽然历经多次蕃礼、汉礼之争，但在此过程中西夏文化逐渐成熟，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又有对中原文化及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西夏文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既保留了本民族文化，也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并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民族特征。

**关键词：**西夏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一百多年前，随着黑水城西夏文献文物的出土，从识读西夏文字及文献整理研究开始，西夏学由此发端。如果说，文化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产物，那么也可以说，西夏学就是从认识研究西夏文化开始的。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包括的范围很广泛。一般所指的西夏文化，是以精神、非物质为主的具有西夏民族和地域特点的文化形态，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作为西夏文化研究的对象，已涉及多个领域，比较侧重的是在文字文献、宗教信仰、法制构建、绘画雕塑、建筑艺术、民风习俗等领域，这些领域一是遗存较多，二是内涵丰富，三是特征鲜明，是西夏文化的标志。

20世纪初，俄国学者凭借占据大量黑水城出土文献文物的优势，首先对其中有关解读西夏文字和语言的文献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等进行了辨析和整理，抓住西夏文文献这个认识西夏文化独特性的关键，取得了重要成就。也是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在艰难条件下开始了对西夏文化的研究。著名学者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苾从《番汉合时掌中珠》入手研究西夏文献，此后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对西夏研究予以关注支持。王静如在1932—1933年撰著出版的《西夏研究》三辑，代表了当时国内西夏研究的最高水平，奠定了研究西夏语言文献的



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夏学研究开启了新局面，对西夏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仅对西夏文化所涉及的许多领域都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充分展示了西夏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且对西夏文化的基本属性也有了愈来愈清晰的认识。针对西夏文化是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的一种中亚文化的偏见，中国学者明确指出：“夏国在党项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和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sup>①</sup>史金波先生在对西夏文化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西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传统相互交织、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有重要贡献”<sup>②</sup>。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正确认识西夏文化及指导西夏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一、西夏文化的形成

西夏文化的形成大体有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形成阶段。

### （一）准备阶段

西夏立国前很长时间里，作为在唐与吐蕃边境地区即今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一带活动的古老羌族的一支党项羌，虽然从隋朝开始即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但其经济社会发展还很落后，仍处在单纯的游牧生产方式阶段，“不知稼穡，土无五谷”，其文化形态是原始的、封闭的、单一的，无文字，“无法令赋役”“候草木以记岁时”<sup>③</sup>。由于不堪忍受吐蕃的欺压，从唐贞观开始，陆续迁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等地，唐朝设羁縻州予以安置。这是党项历史上第一次大迁移，从青藏高原迁往黄土高原，党项人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其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经过大约一个世纪，至安史之乱后党项羌继续东迁，由庆州至灵、夏、银、绥等州（今陕北地区），进入了一个历来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密切交往的地区，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都深刻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更为密切。这个时期唐王朝在周边推行羁縻政策，对党项部众予以“招抚”，使其成为唐之“编户”，任命党项部酋为刺史或其他官职。党项羌以往封闭单纯的文化环境完全被打破，不仅更快更多地接受中原文化，而且自身力量壮大，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党项首领拓跋思泰任静边州都督时已有领地十二个羁縻州，其子拓跋守寂被封为西平公，其孙任银州刺史，其曾孙拓跋思恭据宥州。今陕北之地成了拓跋家族的势力范围。唐中和元年（881年），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

<sup>①</sup>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0页。

<sup>②</sup>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页。

<sup>③</sup>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1页。

升任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夏州地方政权。党项统治者受到唐王朝如此器重，与他们迅速地接受唐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融入以夏州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区域直接相关。

以夏州为中心的陕北地区早在西汉为汉匈争夺之地，至东汉匈奴被击败，陆续迁徙而来的内地官兵落籍为民，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在这里扎根。五世纪立足夏州的最后一个匈奴地方政权大夏被灭，加速了这一地区的汉化。党项拓跋进入这一地区后，很快接受了当地的文化现实，改变着本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近年在榆林周边的横山、神木、靖边、乌审旗等地出土了唐、五代、宋、金时期党项拓跋上层贵族墓葬中用汉字镌刻的墓志铭和墓盖，还刻有如同汉画像石中出现的云气纹、神兽等边饰花纹以及受道教影响的八卦纹，说明党项上层已深深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把中原汉族的文化习俗融入自己的生活中。

从历经唐末五代至宋初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百年时间里，作为夏州统治者的党项首领抓住时机，扩充实力，坐大地盘。宋太宗采取将党项拓跋调离夏州的做法，以求取消其夏州的政权。当时任夏州蕃落使的李继迁强烈反对宋廷收夺党项拓跋的世袭领地，他以夏州东北地斤泽为根据地，聚集蕃部，举起反宋大旗，以求恢复祖业，重建夏州政权。李继迁以为“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循庸众”，要使“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sup>①</sup>。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党项上层充分意识到，要与中原抗衡，非但不能放弃对中原的认同，而且必须强化吸取中原文化，以为“进取之资”，方能“成霸王之业”。当李继迁走出地斤泽后，不仅看到了一个战略发展的新空间，而且对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体验，大大增强了党项学习中原文化、提升自己民族地位及独立建国的欲望。

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战死，李德明与宋修好，宋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但李德明仍然用武力扩大统治地盘，积极做着建国准备。其准备建国的核心是学习和引进宋朝的文化和礼制。李德明“晓佛书，通法律”<sup>②</sup>。景德三年(1007年)，德明求宋赐大藏经，反映了党项上层由原始鬼神崇拜、巫术信仰向中原广泛传播的佛教信仰的转变。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德明在延州鳌子山大修宫室，他出巡鳌子山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sup>③</sup>。天禧二年(1019年)，在怀远镇修建宫殿、宗庙、门阙、官署，以为建都奠基。

这一系列变化说明，此时的党项领袖已充分意识到，吸收中原文化才是党项的出路。事实正是如此。党项部众在陕北地区约200年的时间里，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汉族密切交往交流，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党项上层受唐宋朝廷授权封官，越

①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②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3页。

③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来越多地受到中原政治制度、文化礼仪的深刻影响，迅速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这个时期是党项民族从上层开始文化观念发生质的变化、本民族文化形态开始酝酿生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可看作是创建西夏文化的准备阶段。

## （二）形成阶段

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卒，李元昊继位。李元昊是在与宋王朝深入接触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sup>①</sup>。之后，李元昊称帝建国。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采取多种措施，突出自己的民族意识，废除唐、宋的赐姓李、赵，改为党项姓嵬名；令党项人发秃发，耳带重环；创制文字，制定法律；修建宫殿、行宫、陵园，试图在建筑、服饰、器物装饰等多个领域凸现本民族特点，表现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文化特征。

但党项的强大和立国意识的日增，是在中原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培育起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认同的历史轨迹决定了西夏文化的未来走向。李元昊立国号为“大夏”，反映了追求中原王朝统治模式和续统的强烈愿望。西夏国的大政如官制、兵制、建都等方面，均仿照中原王朝的礼仪，吸收和借鉴唐、宋成熟的做法，设立文武百官，建立完整的封建统治机构，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继承汉唐以来的州县制，在畜牧区设立以部落制为基础的监军司。西夏的经济发展也不墨守成规，在注重传统畜牧业的同时，把农业生产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广牛耕，兴修水利，引进技术和工具，促使西夏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农耕文化渗透到西夏社会内部。李元昊的继任者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以儒治国的道路，他们倾慕汉文化，尊孔读经，崇尚佛教。从本质上看，西夏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变革措施基本上是中原王朝典章制度及其封建文化的翻版。如宋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国（宋朝）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sup>②</sup>李元昊称帝后，时任延州知府的范仲淹曾致书元昊招降，信中指出：“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sup>③</sup>这些当世人的表述，更直觉地揭示了西夏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属性。

这个阶段，西夏在倡导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给西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西夏文化的丰富和壮大提供了条件。西夏文化进入发展的新阶段。西夏文化在精神、物质、制度等诸方面渐行成熟，成为具有自己形态特征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西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200年时间，是一个不算短暂的阶段。经历了20多年蒙夏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②[宋]李焘等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中华书局，1985年，第3641页。

③[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

战争后，西夏灭国，西夏故地为蒙古占领。西夏灭亡的结果，是使大批党项人融入蒙古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中，还有部分党项人四处流散，党项作为一个民族渐渐消亡了，新的民族和民族文化进入这一地区，有西夏特征的诸多文化形态渐被边缘和湮没。这是历史上民族政权及地域更替过程中常有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夏时期所创造的文化彻底消失了。西夏文化的种种形态和元素，或融入新的时代主流文化中，或成为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或沉寂于历史的积淀中，等待着被发现被认识。西夏文化尽管有过在历史舞台上耀眼的时光，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这一过程。

## 二、西夏文化的主要特征

### （一）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为主要基因

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因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情况。但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从未中断，在地理、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中，文化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一个重要因素。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原汉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周边各民族文化向中原聚集，虽然融合与冲突交互作用，但主流还是文化融合。这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众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它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又辐射、滋养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许多少数民族文化无论曾经有过什么形态、经历过什么变迁，都或早或晚地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失去依靠，很难发展。这是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中的一个共同特征，西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实证。西夏治国的基本思想和方略，是源自儒家思想和中原政权的统治经验；西夏立国的制度和法律规定，是依据于唐宋的政权架构和法典；西夏文字的创制，是仿汉字衍生；西夏崇尚汉地佛教，所译佛经《大藏经》，其母本主要是宋版开宝藏；西夏的建筑，基本上是以宋代成熟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为依据；西夏王陵建筑深受宋陵格局的影响；西夏丰富多彩的艺术，主要吸收中原汉地的艺术传统和艺术营养，等等。

西夏文化的这一基本特征，是由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所决定的。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既想独立，又不得不依附；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又不得不充分吸收利用中原文化，最终共同走上了“多元一体”格局的道路。西夏文化的形成，又源于它所具有的许多优势，其中比较明显的，一是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在迁移至紧靠中原腹地的陕北及河套地区后，中原农耕地及中原王朝传统的政治、军事、法律制度对党项民族的成长和西夏政权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具有模范式的影响；二是在长久的民族文化交流 and 比较中，西夏统治者选择了儒家思想和文化礼仪作为立国之本。西夏所确立的以儒治国的方针和举措，使西夏很快融入中华大文化圈内，这是西夏能在较短时间里发展强大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项原来是一个弱小落后的民族，即使立国后在文化上也处于附属地位。但就是这样一个原来的弱小民族、地方政权，却积极吸纳先进文化，适应环境变化，进行自身变革，迅速地武装自己，巩固了政权，壮大了实力，不仅形成与宋、辽的鼎足之势，还创造了中兴之世。这个变化和效果，足以说明吸收先进文化的重要性。

## （二）突出本民族特征，吸收多元民族文化

多元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西夏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力求表现本民族的文化形态、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创制西夏文字是西夏文化发展的标志；大量多种文字的西夏文献的发现，表明西夏文化曾经有过的繁荣；用本民族文字创建完整系统的治国法典，是中国法制史上一次成功的革新；大量绘画、书法、雕塑、建筑作品遗存，表明西夏艺术创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建筑、印刷、锻铸等科技行业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西夏时期先后出现了对历史文化做出贡献的各类历史人物，如开国皇帝李元昊，创造文字的野利仁荣，倡导以儒治国、以法治国的皇帝崇宗乾顺、仁宗仁孝，发展文化的宰相斡道冲等。

与此同时，西夏还广泛吸收与之相邻相近和有过密切交往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西夏境内的民族成分较多，除党项人、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吐谷浑人等，所谓“表里山河，蕃汉杂处”<sup>①</sup>。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不断交往交流的环境中，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必然给西夏文化的构成注入多种成分。西夏佛经中有一部分译自梵文和藏文佛经。元昊延请回鹘高僧到兴庆讲经说法，将西域佛教文化引入西夏。西夏兵制中，吸收吐蕃兵制的一些规定，如设“正军”和“负担”，就是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西夏的发式、服饰，吸收了汉、吐蕃、回鹘甚至鲜卑的一些习俗。西夏的秃发即是李元昊攀附鲜卑皇族拓跋氏的结果。西夏妇女的发式也效仿回鹘女子梳高髻、戴冠饰。西夏壁画和唐卡绘出的几十种乐器中，就有来自吐蕃、回鹘、天竺、契丹、女真和宋朝的各种乐器。在西夏绘画中，除了中原画风外，也有西域、中亚的影响，甚至印度、尼泊尔风格的影子。

西夏在地理位置上占据黄河上游与中游衔接的地域，是紧连汉族形成壮大的中心地区，也是历来北方各民族密切交往的地带。这一区域的先天条件，不仅使党项——西夏依傍于强大的汉文化，得占先之便、汲取之利，能够迅速转型和发展，而且也十分有利于吸收不同的地域文化以丰富自己。在西夏活动的范围内，河西走廊自汉开发以来，经济上宜农宜牧，文化上儒学发达，民族间交往密切，又受到丝路文化和西域中亚文化的多方面影响；银川平原的黄河农耕文化基础雄厚，作为西夏的建都之地，水利发达，农业兴盛，交通畅通，人口众多，是教育、儒学和佛教的基地，自然成为西夏文化的中心；同时还有长城沿线的移民文化，阴山南北草原的游

<sup>①</sup>[清]周春著，胡玉冰校补：《西夏书校补》，中华书局，2014年，第73—74页。

牧文化，这些历史上形成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都对西夏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为西夏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西夏文化是个缩影，它体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西夏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元素，由小到大，发展壮大，形成有自身特点的民族文化，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洪流中。这也说明，我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以融合为主，个性差异缩小，共同因素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繁杂，内涵越来越丰富。

### （三）充分体现浓郁的宗教色彩

党项在早期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崇尚巫术占卜，这种原始的信仰随着党项东迁、与中原文化的密切接触，逐渐被佛教信仰所代替。从李元昊开始，佛教在西夏经历了奠基、传播、崇尚、繁荣几个发展阶段。西夏统治者看到，佛教在启蒙、净化、束缚民众思想，巩固政权统治方面，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夏统治者接受了佛教的思想体系，并将佛教信仰普及到民众之中。统治者上层崇佛礼佛，引导下层民众逐渐信佛拜佛，社会有了共同信仰，起到了稳定的作用，同时对于影响统治的不同思潮也有所抑制。史金波先生还认为：“佛教传播的需要，可能是西夏文字的创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西夏文字创制后，又自然地促进了佛教进一步的广泛传播。西夏佛教的广泛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应用。”“为了适应西夏佛教的发展，西夏培养和使用了不少谙习西夏文、汉文和藏文的人才。”<sup>①</sup>西夏佛教的广泛传播，大大推进了西夏绘画、雕塑、书法、建筑艺术的发展，在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有很高水平和价值的艺术作品。佛经的刊印，也促进了西夏印刷业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提高。西夏的许多文化成就和艺术作品是因佛教而产生。佛教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文化形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西夏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起着深刻影响的作用。同时，西夏文佛教经典和艺术中又蕴含着西夏语言、哲学、伦理等文化内涵和特征。

五代之后，佛教发展走入低潮，但却在西夏逐渐兴盛起来，到了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靠近吐蕃的河西地区盛行起来。“藏族僧人倍受宠信，藏文佛经大量被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藏传佛教洞窟形式和壁画内容的出现，藏传佛教风格塔寺的建设，证明河西地区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地区。”<sup>②</sup>这一变化，为以后蒙古灭西夏占领河西地区后，与西藏佛教领袖取得联系，促使西藏地方接受蒙古统一管辖打下一定基础。

总之，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倡导，不仅使西夏文化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也对佛教的

<sup>①</sup>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98页。

<sup>②</sup>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01页。



传播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夏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贡献，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是有代表性的，西夏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少数民族文化中是一个典型。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夏研究从起步至今已有百年，起步之初因出土文献研究而发轫为一门学问，很长一段时间，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文字、文献、文物考古等领域，首先是在发现整合资料、弄清史实上有所突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深入，史料的进一步丰富，民族史学理论的支持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许多史实及认识上的盲点得以破解，使得对党项民族、西夏政权的宏观认识有了提升，包括对西夏文化的形成、特征及地位评价更为明确，西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党项西夏文化这个个案的解剖，不仅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政权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描述，而且使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意义，对中华文化的构成和发展，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因此，对西夏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超过对西夏文化本身的认识。

（责任编辑：彭向前）